

抗日战争史论文集

——中国现代史学会第四、五次学术讨论会

中国现代史学会编

春秋出版社

抗日战争史论文集

——中国现代史学会第四、五次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中国现代史学会

春秋出版社

1989年·北京

抗日战争史论文集

——中国现代史学会第四、五次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中国现代史学会 编

出版发行：春秋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7.375印张 191千字

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50册

ISBN 7-5069-0138-2/K·5

定 价：2.35元

编辑说明

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并掀起了多次反侵略战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第一次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是全民族的神圣抗战。全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提高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总结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是很有益的。

中国现代史学会于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和1987年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时，曾先后在成都、青岛举行学术讨论会。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99篇，涉及问题极其广泛，对抗战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人物、中外关系等均进行了探讨研究，并展开了热烈讨论。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收集了很少一部分论文，并且作了压缩，另有一部分论文作了简单摘要。同时，我们将两次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全部附在后面，两次会议的学术报道也收入，供读者了解讨论情况。

本论文集编辑工作在副会长丁守和同志主持下进行。曾景忠同志受委托负责全书的编辑工作。陈崇钊同志参加了论文的初选，副会长王桧林同志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几位研究生做了一部分论文的摘要工作。他们对学会工作热心参加，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中国现代史学会

1988年5月

目 录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王桢林 (1)
中国全民族抗战中的两个战场	柳茂坤 (11)
论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几个问题	陈崇钊 (23)
抗战初期徐州会战述评	冯 治 (32)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述评	虞崇胜 (44)
论抗战时期的中间党派	曾成贵 江 峡 (55)
华侨在支援祖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的作用	洪卜仁 孔永松 (65)
董必武与国民参政会	郭 军 夏琢琮 (78)
唐生智与南京保卫战	孙宅巍 (90)
浅谈民族工业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孔祥征 (101)
抗战期间中国石油工业的建立	孔庆泰 (112)
八年抗战中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及其作用	田 玄 (121)
抗日战争时期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及其意义	李光一 (13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华政策	丁则勤 (139)
汪伪和平救国军的建立、发展和消亡	石源华 (149)

论文摘录

试论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张建祥) (157) 论抗日战争的开端 (王维礼、高二音) (158) 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 (金普森) (159) 略论抗战前夕国共关系演变的历史条件 (肖星、高峻) (161) 略论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原因 (傅绍昌) (162) 榆关抗战略论 (戴绪恭、饶东辉) (163) 试论抗日战争中我军的战略方针 (杨牧、宋越、路平) (164) 试析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战场 (秦英军) (166) 试论抗战初期国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彭敦文)(167)	论抗战时期正面战场两次大撤退(崔义中、苏光明)(168)	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曲家源)(169)	抗战初期华北战场失利原因及其地位作用初探(孙彩霞)(171)	南京保卫战双方兵力损失考(孙宅巍)(172)	气壮华夏 国魂永存——国民党抗日殉国将士评介(肖银成、邢庆洲)(173)	武汉会战大别山北麓战场述评(徐有礼)(174)	中国远征军概述(张杨)(175)	缅北滇西作战及其意义(黎宁)(177)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问题(张建祥)(180)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几个问题(张钢杰)(180)	试论我党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在抗战时期的运用和发展(丁道广)(181)	试论全国抗战爆发前救国会的基本政治主张(宋俭)(182)	评救国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郭绪印、盛慕真)(184)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爱国华侨(林炯如)(18)	试论抗战前期民营工业的内迁及其发展(梁士刚)(185)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资源委员会对工业的垄断(王宗荣、林木)(187)	试述国民党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金德群)(188)	试析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李学昌)(190)	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起落(谢增寿)(191)	云南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丁宝珠)(192)	汪精卫通敌卖国原因初探(柳蕴琪)(193)	日军祸豫八年(陈传海、徐有礼)(194)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吴蕴山、侯衔正)(195)	关于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外交(胡京春)(197)	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吴蕴山、侯衔正)(198)	中国现代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成都)论文目录……(200)	中国现代史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青岛)论文目录……(208)	中国现代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综述……陈廷湘(215)	中国现代史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综述……吴明(2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王桧林

1937年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作为中国通史一部分的抗日战争史的科学的全面的研究，还为时不长，许多史实真象尚未搞清，或者事实俱在没得到科学的阐述。台湾出版的某些抗日战争史书，由于政治原因，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说成“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这是不能说服人的。大陆上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存在着片面的不科学的看法。因此，这段历史的研究，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观点要确立，有些史实要搞清，有些看法要否定，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总结出正确的历史经验。这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大有好处的。

一、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是不是包括在“人民”之内？在抗战胜利中有没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这个问题是抗日战争史中一个重要问题，它牵涉到许多具体历史事实的写法。许多作者认为人民中不包括蒋介石集团，有的认为应该包括，但采取回避态度或模糊的论述。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问题，有利于台湾和大陆的中国人的团结统一。

抗战时期蒋介石集团不包括在人民概念之中，这种看法来源很早。从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国民党积极进行反共活动的时候，共产党有时是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人民之外的。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在揭露

了“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之后说：“这一套，不仅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地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的演说中又说：“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两家里应外合，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这里，蒋介石同汉奸卖国贼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其实毛泽东指出的是当时一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性，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成为事实。然而，这种看法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1951年6月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说：抗战期间“在国内方面，存在着人民、国民党和汉奸三种不同的力量”。蒋介石集团“既不同于汉奸，又不同于抗日的人民”。这里虽然没有把蒋介石集团放在汉奸一类中，但不属于人民是很清楚的。随后聂荣臻在《中国人民怎样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间，经过了极为艰险、曲折和复杂的斗争道路，进行了英勇的胜利的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解放区战场的胜利，终于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阴谋，争取了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上面的话可以做这样几点分析：（1）抗战胜利完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斗争得来的。（2）蒋介石集团在抗战期间搞妥协投降阴谋，他们是反动派。（3）夺取抗战胜利的功绩没有蒋介石集团的份儿。这种看法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种指导性的观点。

按照上述思想观点论述抗日战争史，是普遍的现象。例如，有的书上说：“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就组成为中国抗日阵营中的暗藏的投降派。”（廖盖隆《全国解放战争简史》新版第32—33页）有的书上说：“从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也证明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马仲廉

《抗日战争史话》第221、222页）上面这些总结性的论断不适当地突出了一些方面，忽视和抹杀了另外一些方面。大量文献记载和上述看法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这样的例证可以举出很多。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是比较积极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点一直是肯定的。1939年冬到1940年初，1940年冬到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恶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没有把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等同看待。1941年6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名发的一封党内指示电中说：“目前我党方针在拉蒋抗战。”只根据某些文件，把蒋介石说成同汪精卫一样，或者把蒋集团说成完全的反动派（不是说它没有反动的一面），是同共产党全面的正确的估计不合的。

区分人民和敌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蒋集团既然抗日，就应包括在人民范围之内。

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是否仍在抗战呢？应该是肯定的。对国民党的抗战，共产党始终是支持的。1944年2月毛泽东在一封党内指示电中说：我告郭（郭是当时蒋介石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引者）“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1945年4月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报告中肯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同时也承认，“这八年中，我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与一切抗日的友军，协同保卫祖国”。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军队同日军进行过数次战役，有的战役还给日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个时期国民党军队同日军在缅甸战场进行过恶战苦战。说国民党军队在武汉失守后基本上没有同日军作战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肯定国民党抗日，并不因此就否定他们与日方秘密接触、谋求妥协，就否定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就否定共产党同他们的反动活动作斗争是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条件。但他们始终没有投降，始终没有同共产党完全决裂。他们的抗战坚持到日本投降。因此，在论述取得抗战胜利的功绩时，把他们排除在外，是不恰当的。

二、武汉失守以后，中国的主要矛盾 是中日矛盾还是国内阶级矛盾？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认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或者稍晚一点从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内阶级矛盾，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中日矛盾则降到次要地位了。那么整个抗战期间为什么蒋介石集团始终没有投降也没有同共产党彻底决裂呢？解释是：那不是由于中日矛盾起着决定作用，日蒋矛盾无法调和，“只是”或“主要是”由于人民的反对和斗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共产党对战争全局的分析和抗日实践的。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这种看法，不是后来凭空产生的，是有文献根据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从这时（按指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由此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由中日民族矛盾转变为国内阶级矛盾了。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国民党虽然对日妥协投降，以对内反共反人民为主，但共产党还在领导人民抗战，所以中日矛盾仍是主要矛盾。这不过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设想，如果国民党政府已经以进攻解放区为主，而共产党仍以抗日为主，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上述观点成为以后抗日战争史研究和著述的一种指导思想。1948年1月陈伯达写成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中说：武汉失守之后，“蒋介石的作战重心……指向共产党”。“蒋介石由消极应

战的政策转移到观战与求和的政策，因此，重点也就由对外转移到对内，由联共的政策转移到‘防共’、反共的政策”。1980年出版荣孟源的《蒋家王朝》中有这样总结性的话：“抗日战争八年，国共合作八年，也是蒋家王朝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的八年”。198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上说：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总之，以武汉失守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分界线，国民党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到对内的说法，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说法。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国共关系、对抗战时期各种矛盾、对整个战局，有更多的更全面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相反的看法。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加紧了反共的步骤，在许多地方制造磨擦事件。同时，日本诱降，英美劝降，国民党对抗战产生了极大的动摇。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指出时局存在的危险性是非常必要的。但这里只是说国民党有投降的可能，而不是说已成为事实。6月10日中共在延安召开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他对当时政治形势、共产党的对策、将来可能的变化，做了全面的正确的分析。他指出：

“五中全会还是以联共抗日为主要方向的，但同时已包含着反共降日的因素”。对蒋介石的方针，他是这样说的：“拥护蒋委员长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还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但蒋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时，我们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当然，那时不能不有表示，但须是适当的表示，应以有利团结多数抗战，有利继续合作为原则，而不能随便的轻率的恢复‘反蒋’口号。蒋对共产党存在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

党，这是毫无疑义的。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这里认为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以后，联共抗日仍然是“主要方向”，同时指出蒋介石对共产党怀着敌意，有降日的可能。中共的方针是：对反共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和武力进攻，坚决抵抗予以还击，但是“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摩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

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国民党方面来看。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防共限共反共的决定。但是，是否国民党从此放弃抗日，把反共灭共做为政策重点呢？这需要对国民党的政策做认真的全面的分析。做出国民党政策转变的重要根据，是它在1939年制定的各项反动文件。让我们来分析这些文件。这些文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防共限共反共，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它所要达到的反共的限度，在于是否要彻底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也就是说，反共是政策重点呢？还是抗日是政策重点？国民党发给各省党政军高级长官的秘密文件《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说，“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当以抗日为中心”。说明他们还在打着抗日的旗号。他们的反共以不破裂“一致抗敌”为限度。他们反共的借口是共产党“妨碍抗日”，要求共产党的是“恪守中央命令”。对“处置”共产党的做法，一方面要“严厉”对待，一方面又不要“激成共党之不安”。制裁共产党的活动，要“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要“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由此看来，国民党的抗日和反共两个方面，前者仍是主要的。这种选择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图所决定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着原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大片国土，在大量日军仍然面对着国民党的局势下，国内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日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那种认为武汉失守以后，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意见，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

顺着历史过程往下看。皖南事变时，国共两党的联合几乎破裂，但毕竟没有成为事实。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是中日矛盾这

一主要矛盾在起作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正是这样认识的。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说道：“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这种批评，对今天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某种错误倾向也是适用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被赶出国境以前，在它没有被彻底打败之前，中日两国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过去由于这个矛盾起决定作用，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集团实现了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在中日矛盾没有解决以前，国共两党的斗争，从双方来说都是有限度的，都不想根本破裂统一战线。皖南事变之所以没有造成彻底决裂，是中日矛盾起决定作用的结果。只要中日矛盾起着决定作用，国共两党的基本政策都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确实是如此的。

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及其决定一切的作用，是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根本问题。离开这个根本问题，许多事件和人物就得不到正确的论述和评价。所以，搞清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三、抗日战争中中国存在着一个战场还是两个战场？

关于这个问题的普遍看法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存在着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军作战的战场，叫正面战场或国民党战场；一个是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战场，叫敌后战场或解放区战场。在叙述两个战场的关系时，往往只强调双方的尖锐对立，只讲三次反共高潮时的内战，把双方描绘成俨然敌对的两国，看不见双方有任何战略上战役上的配合和相互支援。这种看法有正确的

方面，但不能做为整体上的结论。说抗战期间中国存在着两个战场是正确的，但说抗战期间中国是一个战场也并不错误，症结在于观察问题的范围和着眼点，是从战争全局上观察问题还是从局部上观察问题，是全面考察国共关系还是只强调国共对立和斗争的一面。

先从两个战场论说起。就我们所接触到的文献来看，正式提出两个战场的说法是在抗战开始数年之后。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说：“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到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的时候，两个战场的提法更明确了。朱德在大会上做的军事报告题目就是《论解放区战场》。他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报告（按指《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这是中国抗战的特点”。毛泽东说的是两个战场，这是非常明确的。但又是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战场这个战略全局上观察问题的，所以才有解放区战场的存在“停止”日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的说法。朱德论的是解放区战场，但他也是从中国战略全局上观察问题的。以上所说，都是在存在着统一的中国战场这个前提之下，论述两个战场的。因此，一提到两个战场，就以为它们完全处于对抗状态，就否认中国存在着统一的战场，是不正确的。当然也不能否定两个战场的存在，因为这是事实，问题在于从哪种意义上去理解两个战场。总的来说，两个战场的关系是国共两党关系的一部分，是既统一又独立的。从战略上说统一的方面是主要的。

上面引证的文献在于说明两个战场的存在，但是就在这时也没有否定中国有统一的战场。此外，从中国对日作战的战争全局，从两个战场的战略战役配合，更直接地论述中国统一战场的文献资料是很多的，有共产党方面的，也有其它方面的。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

论述了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和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问题。毛泽东说的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是把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战场合起来，做为一个统一的战场来考虑的。

1939年初毛泽东曾指出八路军取得成绩的原因有四点：上级领导的正确、指战员的英勇、人民的拥护、友军的协助。关于第四点他说：“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的配合、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战场的配合，在抗战前期是非常明确的事实。

百团大战可以作为我们论述问题的例证。如何评价百团大战，史学界有不同意见，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注意的是这次作战是根据什么战略意图发动的，从战略上看它有什么意义。1940年9月朱德在《扩大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中说：“在目前形势之下，百团大战虽然是胜利的游击战争的战役进攻，但它带有全国性的伟大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敌人进攻我大西北后方及进攻西南的企图。最近敌谋南路由越南进攻昆明，中路由宜昌进攻重庆，北路由洛阳进攻西安，以威迫我全国屈服；而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就部分地错乱了敌人的部署，至少要迟延敌人的进攻。”共产党人对发动百团大战的原因和胜利意义的看法，是从全国性的战略上考虑的，这是当时共产党人的普遍看法。

百团大战的这种战略意义，国内舆论界明白看到并予以赞扬的。1940年9月5日《大公报》社评《瞻望北方胜利》说道，

“现在的军事大势，敌人是正在准备秋季攻势，越南方面已有发动假道之兆，而进窥川境的梦想也正浓厚。大势判断，敌人的秋季攻势将是一个最后挣扎，它必尽可能的拚凑各线的兵力，以为

孤注之掷。正在敌人准备这个攻势之时，我们在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这在局部上是乘虚进击，而在全局上尤有牵制敌人兵力之效。”“这次北线之战，敌军未战，我们先攻；敌军将南侵，我们也北伐。这在战略上讲，也是一种进步。”这种战略观点同共产党的战略观点是一致的。

上面说的是抗战前期的情况。那么，在国民党反动性增长，国共关系转坏，两军之间不断发生摩擦，甚至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之后，上述配合作用是否就不存在了呢？不然。我们认为，只要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着大片中国领土，日军还在作战，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甚至战役配合，就会存在。这是整个战争形势决定的。这种情况不到中日矛盾处于主要矛盾地位的转化，是不会根本改变的。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更加恶化，但是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局势并没有改变，战役和战斗的配合也是有的。1942年7月7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说，“我们应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敌后战斗与正面战斗更好的配合起来。”在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1943年6月新四军第五师散发了争取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传单。即使在国共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作战也是存在的。只要中日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没有解决，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会存在，同时军事上统一的中国战场就会存在，两军在战略上战役上战斗上的配合作战就会存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两个战场存在着对抗的一面。

统一的中国战场问题，不只是游击军配合正规军作战问题，也不只是八路军新四军牵制大量敌人，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掩护大后方的问题，而且是密切关系解放区扩大的问题。解放区的开辟和扩大，是在日军前进、国民党军后退、人民军队前进的过程中实现的。如果这些事情不是在同一战场上进行，是很难理解的。

中国全民族抗战中的两个战场

柳 茂 坤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反对外国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不久，就历史地分成了互为依存又相对独立的两个战场：一个是由国民党及其军队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亦称国民党战场；另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所承担的敌后战场，亦称解放区战场。两个战场的形成与并存，“这是中国抗战的特点”。^①认真研究和把握这一特点，对于加深这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中国全民族抗战中两个战场的形成条件、相互关系和地位作用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索。

（一）

两个战场的产生，是由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主观因素。

从客观条件来看，“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主要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大而弱的中国受到小而强的日本的全面侵略。出现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寡助我进步多助等特点。由于敌强我弱，就决定了我在军事上单靠正面防御是难以取胜的，还必须到敌后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陷敌于两线作战

^① 《朱德选集》第142页。